



引用格式:马灿林,蓝江.对福柯生命政治学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批判[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3):19-25.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3.003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3-0019-07

# 对福柯生命政治学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批判

## A Marxist critique of Foucault's biopolitics

马灿林, 蓝江

MA Canlin, LAN Jiang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生命政治思想是福柯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审视这一思想,发现它与马克思的思想存在着根本差异。其一,福柯在讨论(工厂里的)规训权力时虽曾大段引用马克思的分析,却实则不解其意。在马克思看来,规训权力不过是资本统治的特殊表现形式,并不具有独立地位。其二,在讨论人口治理问题时,福柯剥离了人口的阶级性这一社会属性,将人口还原为一个生物学事实。与之截然相反,马克思则将人口划分为不同的阶级,认为人口的治理乃是阶级的统治。不过,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也有其价值所在,它为我们从生命政治维度认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基于这一视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蕴含着一个生命政治维度,而且使生命政治问题得以澄明:生命政治绝非福柯所以为的权力之自我重组和优化配置及其策略方针,这种耽于抽象的思辨理解根本没有切中生命政治的本质;生命政治不过是深受资本钳制的人们对自身生命价值和政治权益的渴求,唯有破除资本逻辑的主宰,人们才能够获得解放和自由,才能赢获其生命政治权利。

**关键词:**

福柯;  
马克思;  
生命政治;  
政治经济学批判

收稿日期:2017-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16BZX016)

作者简介:马灿林(1992—),男,湖北省黄石市人,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蓝江(1977—),男,湖北省荆州市人,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当代欧陆激进左翼思想。

晚近以来,关于生命政治的讨论愈发热烈,尤其在奈格里、阿甘本、埃西波斯托等人的推动下,似有成为显学之势。但是,若对这一概念进行谱系学考察,很自然地就追溯到福柯那里。显然,正是在福柯那里,这一概念的现代含义——生物性生命进入政治领域——才第一次被确定下来,并被概括在“生命政治”这一范畴中。

福柯(1926—1984)是20世纪对西方思想文化界有很大影响的法国思想家,他的被称作“微观物理学”的“权力形而上学”,赋予传统的西方权力理论以不少新内容,讨论生命政治问题,福柯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有足够代表性的西方思想家。

本文拟简要阐述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分析这一思想对马克思的借鉴之限度与价值,进而从生命政治这一维度认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 一、福柯政治研究:从规训权力到生命权力

生命政治\*问题并非一开始就为福柯所关注。1976年,在法兰西学院开设的课程《必须保卫社会》和同年出版的《性史》第一卷《求真意志》中,福柯首次对这个问题进行关注和研究。在这两个文本中,对生命政治的探讨均只是寥寥几笔,而并非福柯原本的计划。\*\* 尽管如此,生命政治的面貌已被大致勾勒出来:身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节。一方面,权力致力于通过规范化、监视、检查等手段创造出一个既驯服又有用的肉体,它以个体化为目标;另一方面,权力则把出生率、死亡率、寿命、公共卫生和疾病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纳入自己的操控范围,试

图在总体层面创造出优质而健康的人口。福柯认为,“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整构成了生命权力机制展开的两极”<sup>[1]</sup>。在这里,我们发现,福柯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对自己先前的研究作了深化。也就是说,原先针对肉体的规训权力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独立的权力技术、机制,相反,它现在被统一于一个新的范式即生命权力之下。

何谓生命权力?简言之,即权力的技术化。这种技术化的权力不仅瞄准作为个体的身体,而且瞄准作为整体的人口,也就是说,它针对的是人的生命本身。这种技术化的权力管辖着与生命有关的一切事物,包括生命的生产、调整、管理、维护、增强和控制等。福柯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现象:从17和18世纪开始,生命就已经成为权力之新的对象和目标。福柯强调,这里的“生命”并非某种政治存在或政治生命,而是属于生物学层面的生命存在。用阿甘本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与其形式相脱离的赤裸生命<sup>[2]3-4</sup>。伴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作为一个生物性存在的人开始进入政治领域。现在,政治权力围绕生物性来运转,并且通过它来实现自身的繁衍、增殖和播散,从而进一步扩大权力的范围。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得以重新配置,并且获得换代升级。基于此,福柯认为,“一个‘生命权力’的时代开始了”<sup>[2]90</sup>,政治也由此而转变为生命政治。

在《必须保卫社会》的最后一讲中,福柯补充道,这种生命权力可以很容易地转变为它的对立面即死亡权力。这一点听上去似乎不可思议。既然权力并非压迫性的而是生产性的,那么它如何可能从呵护、关爱生命转变为杀死生命呢?然而,福柯认为这并不矛盾。如前所述,生命权力的基础是我们的生物性存在。这就使

\* 笔者认为,将“biopolitics”一词翻译成“生命政治”不如“生物政治”更为贴切。因为前者虽然表达了生命成为治理的对象这一含义,但未能指出现代政治将人还原为一个生物学事实这一更为重要的意思。

\*\* 前者试图以战争为分析工具,发展出一套迥异于主权利力的权力范式;后者则主要讨论了性话语在西方历史中的演变。

得国家有可能通过引入种族主义,在它的居民身上实现某种生物学上的切割、区分,从而将一部分人划分为优秀的血统,而将另一部分人视为劣等种族,甚或被看作前者的威胁因素。于是,生命的逻辑便转化为死亡的逻辑:消灭后者,恰恰是为了维持前者。“如果你想活,你就必须使人死,你就必须可以杀人。”<sup>[3]194</sup>而且,后者死得愈多,前者的生存就愈加巩固。福柯认为,这一生与死的辩证法正是生命政治运作的基本原则。

但是,在福柯从规训权力到生命权力的思路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逻辑转换。在此之前,权力被看作是无主体、非中心的,它弥散于社会各个角落,充斥于医院、学校、兵营、监狱、工厂等社会机构之中,并且威胁着统一的法律权力,似有取而代之、将法律社会变为规训社会之趋向。然而,随着人口问题的出现,这种微观的权力分析模式显得无能为力。因为人口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宏观的国家问题。于是,福柯就启用了“生命权力”这一新的范式,开始将原先不愿讨论的国家权力重新纳入到他的分析视野之内。对于福柯来说,在生命政治这一新的基础上,微观的身体规训和宏观的人口调节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但是,二者究竟是如何衔接起来的呢?毕竟,按照福柯的看法,它们并非产生于同一源头。如果只是说在某些方面<sup>[3]191-193</sup>,微观权力与宏观权力可以相互配合、相互铰接,共同建构起一个规范化的社会,那么,这显然是不够的。在其他方面,它们同样可能因为相异的逻辑而互相排斥。换言之,生命这一对象和目标本身并不构成两种权力机制统一起来的真实基础。相反,这一基础只有在两种权力机制的共同特征和规律上去寻找。对此,在后文中,我们将首先说明,在生命政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对福柯进行了批判,而且对福柯遭遇的这一困难作了解释。

## 二、福柯对马克思的借鉴:限度与价值

关于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福柯<sup>[4]14</sup>本人有这样一段自白:

“我经常引用马克思的概念、句子和文章,但我觉得不一定非得要在页脚注明出处并附上毫不相干的评论……我引用马克思,但我不说明,不加引号,并且因为别人无法辨别是否是马克思的文章,因此我被认为是不引用马克思的人。物理学家在研究物理时感到有必要引用牛顿或爱因斯坦吗?”

这一点很有趣。因为福柯一直以来或多或少都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但从福柯的这一自白出发,我们有可能重新审视两人间的复杂关系。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曾以工厂为例来讨论规训权力的具体运作方式。我们发现,福柯在这里多次引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中马克思关于协作、管理等问题的分析。首先,协作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生产力。这表现在:(1)通过把劳动者聚集在一起,它可以形成一种平均的社会劳动力,从而避免单个劳动力的局限与风险;(2)通过在劳动者之间形成一种内部的分工和配合,它可以创造出一种集体的生产力;(3)由于众多劳动者组织在一起,这将在他们的心理层面引起一种变化,即“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工作效率”<sup>[5]379</sup>。显然,在福柯看来,这种对空间的编排和力量的组合正是规训权力的体现,其直接结果就是一具生产性的肉体的诞生。由此,在工厂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被镇压、被强制的工人形象,而是一个充满活力、富于竞争精神的工人形象。但是,不得不

说,福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源的提取是误导性的,因为福柯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关于协作的分析是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一题目下加以探讨的。在马克思看来,协作本身作为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生产方式,对其决不能仅仅从生产力这一方面来认识。相反,这种生产技术的变革恰恰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发展起来的。因为单个的工人本身不会发生协作关系,只有当他们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成为资本的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的时候,生产过程的这种社会化合作才得以展开。因此,这种生产力恰恰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其根本上是服务于资本的增殖需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性的规训权力正是资本的特殊权力。同样,为了说明权力的“全景敞视主义”功能,福柯把工厂里的管理、监督等职能抽象出来,将它们绝对化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但是,福柯没有注意到,这种管理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二重性,即一方面它是为了保障生产过程的效率,另一方面它又服务于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并且后者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管理权力并不先于资本,相反,它是资本的一个产物。“资本家的管理权力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一种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sup>[5]384</sup>正是对这一点的忽视,导致福柯撇开社会生产关系本身而从纯粹的权力技术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然而,福柯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忽略权力技术背后的剥削性质,更在于把权力技术的特征放大到整个社会领域,使之成为一种普遍的准则,由此错误地将资本主义社会称为一个“惩罚性社会”或“规训社会”。比如,在学校教育问题上,福柯考察了权力是如何人为地制造差异、区分等级,并把规范化到学生意识之中的过程。然而,无论这种分析多么精彩,它始终没有切中问题的实质。因为问题的要害在于:这

种规范为什么对于学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或者说,一个驯服的学生意味着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分析,或者说指出了问题的要害。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篇著名论文中,阿尔都塞从再生产的角度出发指出,为了进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满足于仅仅要求一个劳动者技能合格,它还要求一个劳动者在意识层面完全服从规范。因而,学校等教育机构绝非没有立场的中性的场所,而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通过把其中的个体训练成驯服的主体,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意识形态灌输给他们,使之对现存秩序加以认同,从而实现统治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阿尔都塞说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多样性的功能恰恰在于它们惟一的——因为是共同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作用。”<sup>[6]</sup>然而,到了福柯那里,这种生产关系的维度却被忽略了,学校成了一个单纯的权力技术的部署空间。对权力技术的背景或环境因素不加考虑,这正是福柯的致命缺陷,也是导致他把工厂、学校、兵营、医院、监狱等所有这些社会机构同一化并称为“监狱群岛”的原因。对此,勒格郎在《被福柯忽略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说,“监督与惩罚并没有构成一种抽象的形式、一幅‘权力图’或是一种‘总体方法’,它们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转和生存环境的联系中获得意义”<sup>[4]31</sup>。这一判断是准确的。

因此,在生命政治的微观个人层面,福柯忽视了权力背后资本关系的本体地位;而在生命政治的另一维度即与人口有关的治理问题上,福柯亦走入了误区。对于福柯来说,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是18世纪伴随政治经济学一起出现的一个范畴。这个时候,人口不再被看作是众多法律主体的集合,被当作国家财富和力量的源泉。相反,一种生物自然性被赋予人口概念,这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1)人口不是某种给

定的存在,而是一个受到诸多变量制约的要素,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之中,国家通过控制其他事物可以对人口施加影响;(2)欲望和利益被看作是人口的自然特点,因而国家不是要压抑这些欲望,而是要激发和鼓励它们,为它们提供一个形式框架,放任自流,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将会自动导致整体利益的实现;(3)人口现象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有一定的规律可循,通过观察可以识别出来,这就为人口统计学等知识工具的出现打开了方便之门。<sup>[7]</sup>福柯认为,正是在“生物现代性”这一意义上,权力才有可能渗透其中,并围绕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的出现重新进行配置,改善权力的组织方式,发展出一整套新的治理技术。由此,福柯将自己对生命政治的探讨重新置于“治理技艺”这一框架之下。然而,如此一来,福柯显然就走到了马克思所批判的马尔萨斯的道路上。在马克思看来,人口问题绝不应作为一个生物学问题来考虑,而应作为一个阶级—政治问题来考虑。换言之,福柯的人口概念是抽象的,他没有考虑到人口背后的阶级关系。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sup>[8]</sup>中,马克思曾写道: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

就像不存在抽象的人性一样,同样也不存在抽象的人口,更不用说对人口的抽象治理。在马克思看来,人口首先应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在这个基础上,人口的治理乃是阶级的统治,由此政治也就是阶级之间的对抗和冲突。

但是,福柯剥离了人口的阶级性这一社会属性,将人口还原为一个生物学事实,然后在这个生物性层面上来讨论权力关系,由此,国家也便失去了它的阶级属性,而沦为权力技术的一个载体。显然,马克思对此是竭力反对的。因为如果只是抽象地从权力本身来谈论权力,那么它就不具有任何实质意义,相反,必须将其置于各个时代的经济基础之中来考察。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无论在微观层面还是在宏观层面,各种权力究其本质乃是资本的特殊权力。

进而言之,如果说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具有一定的价值,那么,这种价值就在于启发我们有可能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一种新的解读。这种新的解读正是生命政治学,但又决非福柯所做的那样。这一解读的关键就在于,必须弄清楚生物性是如何从经济领域中产生的。从这一层面上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来就存在一个生命政治的维度。

### 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命政治意蕴

对于福柯来说,生命政治是一个现代性事件,而到了阿甘本那里,生命政治则被追溯为一个自古罗马法权以来就有的本体论范畴。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表明,生命政治实则是一个经济范畴,根本而言,它是伴随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壮大而一同出现的现象。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是从简单商品经济那里发展过来的,其标志便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使得商品生产远远超出原有的规模,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起来。然而,劳动力成为商品必须基于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劳动者有人身自由,二是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当然,资本家将劳动者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是通过种种血腥的暴力手段完成的,马克思称之为原始积累。我们认为,这一点恰恰构成了生命政治的起点。因为正是在这里,生命第一

次被一种暴力方式强制性与形式相分离,从而使得生命被还原为一个赤裸生命或生物生命。但是,对于资本家来说,仅这一点是不够的,这个无产者还必须成为他的雇佣劳动者。从表面上看,这个了无牵挂的无产者似乎是自由的,他可以自由地选择受雇于这个或那个资本家。然而,这种形式上的自由包含着必然的不自由:这个无产者确实不属于任何单个的资本家,但是,他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他绝不可能脱离这个剥削体系而单独存在。因此,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从起源上就是建立在否定生命的基础之上,而且,为了维系这一经济系统的持续运转,它就必须不断地将这个赤裸的生命生产、制造出来,使之在这一经济空间内永恒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以社会的形式重新占有生产资料,并计划地组织生产过程——便是要重新恢复生命的完整性,这是一次将赤裸的生命重新提升为人的生命的革命运动。

正是生命的这一分离导致了劳动力的商品化,其实质是劳动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最重要的生命机能,劳动力是一种存在于人的身体之中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它包含着巨大的潜能,即能够创造出超过自身价值的更大价值。这使得无产者原本有可能通过劳动重新获得自己的形式生命。然而,由于劳动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这就变得根本不可能了。异化劳动描述的正是这一分离造成的种种后果。首先,由于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自己而属于资本家,因此,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不是感到自我生命的实现、满足和确证,而是感到生命的外化和丧失,“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是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种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sup>[9]52</sup>。其次,由于劳动不为自己所支配,工人感到自己的生命是分裂的,一种自我的陌生感和疏离感占据他的内心。“在这里,活动是受动;力量是无力;生殖是去势;工人自己的

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sup>[9]55-56</sup>最后,劳动不再表现为一种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交换的活动、一种自由自觉的生命创造活动,相反,它沦为一种仅仅维持工人之动物性生命的活动。马克思对此深刻地指出,“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可能是工人”<sup>[9]53</sup>。至此,人的生命就被否定并走向了其对立面。

劳动力的内在矛盾是资本运作的结果。因为一旦劳动力成为商品,它就转化为资本的特殊存在形式即可变资本,从而成为资本增殖的一种手段。于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再是劳动者利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合目的性的过程,而是生产资料利用劳动者在保存自身价值的同时榨取剩余价值的价值增殖过程。在这里,主客体的关系被颠倒了。作为“积累起来的、过去的、物化的劳动”<sup>[10]</sup>,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本身是一种死的东西,但是,由于资本的赋形作用,它们就变为了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反过来支配人的活劳动、控制人的生命。由此,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表现为一个头足倒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被物化了,物却被人格化了。这种现象在换班制度中得到了最典型的反映。表面上,相比于一味延长工作日的粗暴方法,换班制度似乎是一种较为人道的措施。然而,这种制度的实质是为了避免因为机器等生产资料的闲置带来的损失。因为机器一旦闲置,就成为无用的预付资本,而等到下一个工作日重新启动时,又必然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因此,唯一的方法便是实行换班制度,日日夜夜不断地补给劳动力,从而使得机器一直运转下去。在这里,资本的逻辑明显战胜了人而成为主宰一切的力量。为了追逐利润,资本不惜以生命的失序、萎缩为代价。因此马克思说:“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sup>[5]311</sup>

这一情况在分工和机器大工业时代变得更

加恶劣。在马克思看来,分工作为生产力进步的标志,一方面虽然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工人生命的畸形化。由于工厂内部分工逐渐细化,工人不再负责整件产品的全部生产流程,而只负责这个产品的一个局部生产环节,他的工作从原来广泛的领域压缩为一个狭隘、简单和不断重复的劳动。这就导致工人从总体工人变为一个局部工人,其生命技艺成为多余,身体职能逐渐退化,从一个有机的完整的身体退化为一个单一器官,他被紧紧束缚在单一的操作环节上,一生与这个唯一的步骤打交道,一旦越出这一狭隘的职能,其生命就将面临死亡的风险。如果说多才多艺曾经是生命的意义之所在,那么现在,专业化、局部化或狭隘化就是资本主义所谓的美德。资本主义不仅造成生命技艺的贬值、缩减,而且还使得它进一步分化并畸形发展起来。“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肢体,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sup>[5]404-405</sup>为了成为一个合格的工人,工人就必须把自己变为一个零部件。在资本的眼里,多才多艺就是浪费。事实上,这一退化了的生命技艺在机器大生产时代就失去了立足之地。由于机器的应用,工人的技艺被机器所取代,一大批工人被从工厂中排挤出去,剩下的、寥寥可数的几个工人的工作进一步缩减为仅仅是“服侍机器”,即负责开动、护理和维修机器。于是,如今不仅在生产资料的占有方面,甚至在智力和人格方面,工人都被彻底无产阶级化了。“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sup>[5]487</sup>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生命政治发展到了顶点。

#### 四、结语

由以上分析可知,福柯关于生命政治问题的研究有其深刻性所在。他将人的生命本质与

现代社会的政治发展逻辑密切关联,进而萃取出“生命政治”这个范畴,并从“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的双重视角赋予其丰富的内涵。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突破了对人之生命本质的生物学界划,凸显了人的生命存在的现实性及其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本质关联性。福柯关于人的生命本质的这种政治哲学诠释,一定程度上借鉴了马克思的运思逻辑,然而二者又呈现出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实质上是两种“生命政治观”的对立。对于福柯来说,他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只是停留于政治哲学的思辨,而没有真正切中人的生命的社会本质,即没有能够揭示现实的人与现代社会的资本逻辑之间的本质联系。然而,福柯关于生命政治问题的思考及其思想并非没有价值,而是为我们基于生命政治维度认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 参考文献:

- [1] 米歇尔·福柯. 性经验史[M]. 余碧平,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90.
- [2] 吉奥乔·阿甘本. 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M]. 赵文,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 [3] 米歇尔·福柯. 必须保卫社会[M]. 钱翰,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4] 莱姆克. 马克思与福柯[M]. 陈元,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5]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6] 路易·阿尔都塞. 哲学与政治(下)[M]. 陈越,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286.
- [7] 米歇尔·福柯. 安全、领土与人口[M]. 钱翰,陈晓径,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56-60.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1.
- [9]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4.